



书海行舟

顾志兴 ◎著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书海行舟

顾志兴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海行舟 / 顾志兴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ISBN 978-7-5439-7327-5

I . ① 书 … II . ① 顾 … III . ① 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 ①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5612 号

责任编辑: 胡欣轩 王茗斐

封面设计: 许 菲

丛书名: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书 名: 书海行舟

顾志兴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3 000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7327-5

定 价: 25.00 元

<http://www.sstlp.com>

目 录

上辑 读书随想

浙江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我心中的神圣殿堂	1
培养我考进大学的机关图书馆	25
我读大学和工作过的几个图书馆	35
与杭州、绍兴、海宁、温州几家图书馆的人和书的情谊	47
天一阁是我心中的藏书圣殿	72
我所见到的民国末期和解放初期的小人书摊和小说书摊	79
我与中华古籍相伴六十年	85
皕宋楼藏书秘密流入日本真相	91
大运河是一条书籍流动之河	109

中辑 师友忆注

“文革”中敬谒马寅初先生及相关回忆	115
夏承焘先生给我们讲宋词	127
我的文学梦——怀念老作家陈学昭先生	133
我的恩师胡道静	143
顾廷龙先生为我的书题写书名	151
送陈桥驿老师远行	155

对床夜话约未践，至今思之一泫然——怀念

傅璇琮先生

164

梧桐树，他砍的地方像一只只眼睛——怀念故友

蒋德闲

172

下辑 想到就写

对中国作协启动的一项国家工程的“杞忧”

175

《空城计》是戏，不是历史

179

刘心武，你该写小说

181

“国学解”之别解

183

西湖龙井茶何时名声鹊起

186

召回岳飞的十二金牌，究竟为何物

195

南宋临安城的文教区在何处？——红楼忆古

200

杜甫托梦与东坡辩诗

207

“刘郎”辩

210

河豚鱼种种

213

后 记

216

上辑 读书随想

浙江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我心中的神圣殿堂

人到晚境，喜欢回忆，我也如此，想来想去，活了七十多岁，竟然有六十多年，整整超过一个甲子和图书馆结下了亲密的缘分。从十来岁在浙图受到文化的熏陶，尔后在我所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图书馆借书读书自学四年，居然从一个初一的失学少年考上了大学，成了一名大学生。杭图初创时，在青年路那幢普通的民房里，我去寻访过。在上大学期间，与杭大图书馆朝夕相处四年，除了上课睡觉以外，几乎大多数时间皆在图书馆的阅览室中度过。工作以后在单位图书馆也是常客。自以为做了一件好事，“文革”初起，我所在学校的红卫兵脑子发热，准备将图书馆全部藏书付之一炬，我和他们的头头玩绕口令，使此事消弭于无形。最难得

的是新世纪里又和绍兴图书馆、海宁图书馆、温州图书馆结缘，认识了新朋友，结成了书缘。2000年有幸在国家图书馆纵览浙刻宋元明板珍籍，以致那里的借书人员窃窃私议“来者何人”。此行后来与浙图王巨安君谈起，他羡慕地说：顾老师你福气真好，有的人在图书馆一辈子，恐怕也没有这样好的运气！

回忆平生，图书馆给我良多，图书馆像父母、像师长一样哺育我成长，伴随我从青年、中年到渐入老境。图书馆啊，图书馆，叫我如何不爱您！

浙图是我的启蒙老师，维系的时间最长，整整至今有六十余年，超过了一个甲子。用蔡尚思先生的话来说：大的图书馆，就是太上研究院。说浙图是太上研究院，是实至名归，一点也不夸大。我的心目中有三个圣殿，极为神圣的殿堂。1960年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大四。下半年约10月开学不久，我们全年级同学赴绍兴柯桥贯彻党中央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主要内容是纠正当时农村中存在的“一平二调”。我有幸不久和一位老师三四位同学被抽调到绍兴城里的鲁迅纪念馆帮助整理资料。我在当时的一个感觉是我进入了文学的神圣殿堂，崇高的敬意油然而生。我的第二个神圣殿堂是1990年代初在宁波的朋友陪同下，登上天一阁的宝书楼，作为一个藏书爱好者和研究者，这是我另一个神圣的殿堂。当然我心中第一个神圣的殿堂是浙图。我是个感恩

的人，对别人的帮助我总是心底记着，古人云“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浙图予我以多多，可以说是扶育我成长，至今只有受惠而无回报。我选出自己两部可以过得去的书，送给浙图，在《浙江印刷出版史》的扉页上写上“敬赠浙江图书馆，我心中的圣殿”；在《浙江藏书史》的扉页上写上“敬赠浙江图书馆，感恩浙图对我的滋养”。这是我的心里话，但是人以涌泉滋养，我只有滴水报之。

2015年8月15日，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和浙图联合举办的“艺术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张宗祥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上与温州图书馆的卢礼阳先生相遇，我们紧紧握手。前两年他来杭州公干，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要来看我。我赶紧打车前往他住的宾馆看他，这是初见，岂能失礼。我们一见如故。此次二见，共同回忆那是个细雨濛濛的夜晚。此次见面，我说了四个字是“两心相通”：我俩读过彼此的文章，尤其是连了微信，时时可见他的行踪，他发的微信，每见必读，他对温州文化的见解，对整理瓯地文献的执着，对瓯地文化遗迹和抗日遗地的保护，使我引为同调。有次他说今天收到了几本书，双休日有事干了，这是他在微信上自言自语，他是个读书种子。此次见面，我对他说，不要太苦了自己，冷落了家人，老婆女儿要骂的，他不置可否地笑笑。他听说我给一位年青人著的地区藏书史写

了篇序言，就说交给我，让读书报给发了，我说暂不，我想写篇《我爱图书馆》，他说：好，好，写好给我。

《我爱图书馆》我早想写了。动因有三，一是自己对图书馆感恩，除了师长，图书馆对我培养教育最深。二是《读书报》上游修龄先生的文章，叙其一生，说到最后的职务是农大图书馆任馆长，一生的句号画在图书馆，我真是羡慕得不得了。我一生有三个职业最向往，一是当一名中医师，伸出三个指头为人搭脉，解除病人的痛苦。外婆的死，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当年考大学，本想考中医学院，但要考数理化，只能退避三舍，幻想破灭。再是从小喜欢挖挖掘掘，对田野考古兴趣甚浓。前几年和杭州市文保所所长、全国多项十大考古发现者杜正贤和我的同事徐吉军闲聊，我又说起年轻时的理想，徐吉军先生当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你只看到电视上的镜头，什么马王堆、什么金缕玉衣，你搞考古，可能搞到头发比现在还白，还有什么都没有发现，考古发掘有偶然性，还有运气。他说得对。我也爱图书馆，在那里工作，终日徜徉书海，其乐无穷，这是何等惬意的赏心乐事！记得在《温州读书报》上读到一位瓯籍人士的文章，谈他在温图古籍部读书，得到了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后来调到杭州，对温图更是深深的怀念不已。后来我给《读书报》写过一篇短文，文末劝慰那位朋友，说是杭州的浙图和杭图对读者也是很好的，我有

切身的体会。您和他们熟了，定然能感受到的。图书管理员和读者是天然亲密的好朋友。

临到过了古稀之年，我的第一位也是维系时间最亲密的朋友是浙江图书馆，扳着指头算来有六十余年的缘分，只要我活着，仍然是不离不弃的好朋友。他们不会不要我，就是不要我也会推上去。1951年我十四岁，读了一年省立杭初，家里负担不起学费而辍学，尽管有人为我惋惜，省立杭州初级中学是座多好的学校呀！能考上是多么的不容易！

不读书，就到图书馆去找书看。我初次接触的是地在今解放路的浙图分馆（原是浙江藏书楼的旧址），我在那里主要借阅小说。读杭初时借到过蒋学模译的法国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的第一册（共四册），后面的借不到，但太好看，念念不忘。这部书直到我进杭大中文系读书时还是借不到，灵机一动，期末考试时我想此时大家要复习迎考，书定然会还来，我定能在此时借到。果不出我的预料，借到了，不管考试不考试，我读我喜爱的《基度山恩仇记》（今译本作《基度山伯爵》），当然这是后话了。在这段时间还读了一些苏俄文学，记得有A.托尔斯泰的小说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但外国人名太长，记不牢渐渐失去兴趣，印象最深的是还是大仲马的《侠隐记》（一译《达特安的三部曲》），这段时间也借鲁迅、茅盾、巴金的书看。鲁迅的

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曾经用毛笔写在床头的板壁上，算是励志吧！

后来听别人说，孤山浙图的书更多，就经常跑孤山浙图，借读了什么书，现在想不起来了。管理人员并非因我年纪小（那年记得是十四岁），而对我有所怠慢（我至今认为这是图书馆人的优秀品质）。有次我借了本清刻本的中医书，为我办借阅手续的那位老先生的老花镜几乎滑到鼻子尖上，惊奇地问：小朋友，你看得懂？但决无轻视之意，认真为我办借阅手续。前阵子报上有文章说烟草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很反感此类绝对化的论调，我说：“错，有九十九的害，却有一利，能杀虫，可入药。”就是这本书上看来的。

当然，最重要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这两三年的读书时间里，我见到了张宗祥、毛春翔两位老先生。张宗祥先生时已高龄望七，天天都来上班，只要他在，如今古籍部的门口，就停着一辆他专用的包车，比普通的黄包车略为宽大，车上有块毛毯，大概是用来盖腿的，还有把鸡毛掸帚，用来拂拭灰尘的。这种包车，就是电影《骆驼祥子》中的那种。张先生的午膳是从家里带来的一只腰形铝质饭盒，上格装菜，下层装饭，量都不多。大概中午时食堂帮他热一下，他就一边扒拉着饭粒子，一边从抽斗内拿出一本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边吃边看，这可能是他的休息，换换脑子。因为平时我见到

老人家总是目不旁骛地在抄书，抄书。老人家有时见我午饭时还在，朝我笑笑：小朋友好回去吃饭了。

这里我还想就张宗祥先生读《蜀山剑侠传》说几句话。有人说民国间写小说最多的是张恨水，一生大概著了二千万字以上的小说，其实《蜀山剑侠传》的作者还珠楼主（李寿民）仅“蜀山”一书就达五百万字以上，其所著总字数要超过张恨水是没有问题的。以受众面而论，据我现在见到的材料，还珠氏的书在民国间不仅达官贵人爱读，学者也爱读，普通百姓更爱读。许寅（曾是上海解放日报的名文化记者）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他在民国后期还是一名小学生，一次见到了一名黄包车夫拉客到地点后，就坐在车上略事休息候客，拿出一本书读了起来，许寅在旁一看书名是《蜀山剑侠传》。他也找来读，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几乎将还珠楼主所有作品全部找来读遍。解放初期他当了党报《解放日报》的记者，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还珠，相见恨晚，后来还珠成了他的忘年交。我读还珠的作品，与许寅相似，也是在小学的三四年级，同样几乎读遍了还珠氏的全部作品，我还发现一个许寅先生没说到的细节，还珠的小说几乎没有一部是写完的，这大概是因为同时在几家报纸上写连载有关。我自认为从小古文阅读能力较强，父母是文盲，没人教我读《古文观止》，说老实话是读还珠的作品给我的最早教益。还珠的文字根底不

说今日，我看超过某些当年的大作家，只是走的路子不同而已。

我上杭州大学时读的是中文系，文学概论是必修课，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知读过多少遍，从前有的章节几乎会背。那上面说文学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上世纪 80 年代有所发展，好像是说为人民服务，内涵有所扩大，更准确了。据我所知，许寅所说的黄包车夫，应该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是无产阶级，他们爱读；我见到过从前的店员工人，在站柜台没有顾客时也在看“蜀山”，大学者张宗祥先生边吃饭边看“蜀山”我是亲眼所见，如果有可能找个八九十岁的识字的老产业工人，我估计也能找出他们当年读“蜀山”的故事，尽管这可能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闲话。此外，我还知道当时有身份的达官贵人还嘱咐家人，在书店里见到还珠的作品，尽数买回来。

从许寅的文章中得知，还珠的命运并不好，他的大量的武侠小说的命运更不好。还珠氏先是检讨自己的小说是毒害人民，搁笔停写。还把自己的小说除了留一部“蜀山”外，全烧掉了！留下来的这部书，后来还珠的后人送给了许寅。

世事无常，有时还很吊诡。正当还珠在烧自己的书，在忙于检讨之际，师法还珠的金庸、梁羽生在香

港写起武侠小说，还出了大名，金庸还因而当上博导。金、梁的作品传到了大陆，引发了金庸热，据说原因是小平同志托人从香港买来金庸的小说，消息传出，各家出版社竞相争出，武侠小说的禁区无形中打开。这是件好事儿。我这人有时爱胡思乱想：胡思之一，如果还珠还活着，还能写，他会怎么样？乱想之一，一个人读什么书，应该由他自己作主。好为人师的“有关部门”，可以指导，可以诱导，可以推荐，可以谈你的看法，千万别乱打电话，乱发指示，有时这样做了，可能后来很被动。

去年8月15日炎夏天气，在浙图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召开的“艺术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张宗祥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我作了个发言，题目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中华文献卫士张闻声先生》，称宗祥先生用他的字，不用名，浙图给我的邀请函就是这样写的，我深感到浙图对宗祥先生的尊敬。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前即使同辈人也是称字不称名，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从这个细节上我看到了浙图人的文化含量。至于正式会标上用的“张宗祥先生”，我理解，因为宗祥先生的字闻声，很多人不知道，会搞不清是纪念谁，这是从权，没什么关系。

在上世纪50年代我到浙图看书时还有幸认识了毛春翔前辈。毛先生是保护抗战时文澜阁《四库全书》西

迁的功臣。1951年至1953年间有次到孤山古籍部去看书，在进门处的放目录柜的走廊狭小的空间里，毛春翔先生在这里办起了一个小小的版本展览会，在一张小长条桌上放着浙图馆藏的几部古籍，如今印象清晰有文澜阁本库书的几种抄本，以及明刻的“南藏”还是“北藏”的《大藏经》，最稀奇的是几片贝叶经。毛先生端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每逢读者进出驻足，他必站起来讲解，不因我年少也是如此。这大概是我初次接受的版本目录学教育。张先生的抄校、毛先生为我讲版本，这是我这方面知识最初的启蒙教育。我看到浙图古籍部走廊上的两边的卡片目录柜，有种特别亲切的感情。一则是我多次翻阅这些卡片找书，二则是寄托了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当年我一边翻阅卡片一边找书，心中萌生的一个念头是将来在卡片目录柜上能找到我顾志兴写的一本书，这该有多好。近年我将我写的《浙江藏书史》和《浙江印刷出版史》两书托王巨安君转交徐晓军馆长时，王君问我顾老师你有什么要求要我转告？我说没有什么要求，送书只是我对浙图的感恩，如有可能做目录时能为我做一张卡片放在目录柜中。这下他可有点犯难了。他说现在目录都用电脑做了，不用卡片了，但我定将你的意思转达给徐馆长。蔡尚思先生说，大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今生有幸，我十来岁时进了浙图太上研究院，在其间受熏陶，浸淫一生，小有收获。

1953年我参加了工作，后来上大学，当教师，搞研究工作，渐图去得没有过去勤，但联系未尝中断。还有些可记的事。大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9年或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办了一本读书刊物《书林》。一次该刊主编金永华先生持恩师胡道静先生的信来说金先生来杭组稿，要我介绍些朋友与金先生认识。言谈之下谈起延安时期老作家陈学昭先生，金说上海的朋友介绍可请陈先生写稿，只知她住在浙江医院，还未联系上，而社里打电话来有急事，要我马上回去。我说不要紧，陈先生我认识，约稿的事我替你办。

陈先生当年曾有意收我做她的工作人员，帮她抄稿，但后来陈先生告诉我，她的级别不够（指专门配备身边工作人员），此事遂止。但她一直很关心我，要我努力，有机会她会请时任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的黄源同志设法为我安排一个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工作。我到浙江医院找到陈学昭先生，满头白发，苍老得多了，这是岁月，也是反右和“文革”给她留下的痕迹。转达了金先生的约稿意向。陈先生说，我愿意应约写稿，但你看我在医院里一本书也没有。我想到了一个题目，想就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三部曲写篇文章，你帮我借部《神曲》好吗？我硬着头皮答应了。要知道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人们余悸还在，洋的、古的书还是犯忌的，而这部《神曲》是洋的，还是中世纪的，是

“洋”而“古”的。我判断一般图书馆不会有，只有浙图和杭州大学图书馆可能有，而这样的洋的古书恐不会一下子就开放出借的。我想到了时在浙图大学路总馆工作的林祖藻先生，他是我的一位同事的夫君，我们很熟的。我对林先生说：小林，这个忙你一定要帮，陈学昭先生是一位留法的文学博士，义无反顾地到延安去参加革命，1957年为一句话当右派，“文革”中吃苦头，不说你我是熟人，凭着陈先生的遭遇，这个忙你一定要帮，这是霸王硬上弓了。小林尽管面有难色，最终还是答应了。这样我完成了陈先生的托付，她也写出了文章。我那时还有心研究明清小说，但当时这些书都是不外借的，小林还是帮我借来了凌濛初的初刻和二刻《拍案惊奇》等。我是时时受着浙图的“滴水”。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初，恩师胡道静给我来信，他有部旧稿《沈括诗词辑存》“文革”中抄家被毁，只得从头再来。那时上海古籍社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尚未影印，文津阁本在北京，文溯阁本在兰州，只有文澜本在杭州，而我工作在杭州，就嘱我去抄文澜阁本的《沈中允集》中的沈括的诗词，并将辨别不同版式的注意点亦均写清。我到古籍部找到接待的夏锡元先生。看《四库全书》要凭介绍信，可那天走得匆忙，忘记带来，好不尴尬。只得拿出工作证问能否通融一下？夏先生说：顾先生我知道你，你的一本书里还写到我的父亲